

机器人叙事中的他者伦理：重读《克拉拉与太阳》

高 银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科幻小说中以机器人为叙述者、行动者与观察者的故事构成机器人叙事。作品从人工智能的视角审视科技与人文碰撞下存在意义的终极哲学命题，而机器人他者绝对他异性所产生的间离效果往往能引发读者在伦理向度的深刻反思。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2021 年度布克奖长名单提名小说《克拉拉与太阳》延续了作家在《别让我走》中的伦理思考，通过机器人叙事将关于绝对他者的伦理拷问推向新高度。本文从机器人一词的词源释义出发，以时间为轴讨论机器人克拉拉在与人类少女乔西相遇前、相遇时与交往中身为他律式伦理主体伦理责任不断深化的过程。

关键词：科幻小说；机器人叙事；他者伦理；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文类一直是游走于正统文学边缘的绝对他者。在严肃作家看来，兴于大众文学的科幻小说难以免“俗”；在一般读者眼中，平行宇宙、太空飞船与外星人入侵这些常见情节设定似乎过于“另类”陌异。但是，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及其对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影响，作者与读者都开始重新思考科学技术对后现代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刻影响。这种思考的结果便是日益增多的软科幻文学作品，尤其是以机器人为叙述者、行动者与观察者的机器人叙事。事实上，关于机器人他者及其相关伦理问题的讨论在机器人诞生前已散见于一部部堪称机器人“史前史”的科幻文学作品中。

2021 年度布克奖长名单提名小说《克拉拉与太阳》是诺奖得主石黑一雄为此文体做出的新贡献。这是石黑一雄继《别让我走》之后的第二部软科幻力作。他在作品中不仅续写着科技与人文碰撞下存在之意义的终极哲学命题，更通过机器人叙事将关于绝对他者的伦理拷问推向新高度。机器人克拉拉以第一人称娓娓向读者讲述自己身为人工朋友（artificial friend）竭尽全力偿还他律“原债”，积极应承面对另一者（l'autre）的传唤，在人机交往中为少女乔西忍受一切、支撑世界的动人故事，给身处重重伦理漩涡中的读者带来启迪。

一、机器人史前史：他律式主体

从机器人史前史到现代机器人的诞生，机器人始终被人类造物主钉在他律铁柱上，成为无条件的他律式主体。英语“机器人”（robot）一词最早见于捷克作家恰佩克（Karel Čapek）的科幻舞台剧《罗梭的万能工人》（R.U.R, 1920 年）。该词在捷克语中意为“强制劳动”，斯拉夫语词根 rab（“奴隶”）更加直观地揭示出机器人在科幻起源故事中的仆从地位。数十年后，在机器人尚未成为现实的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巨头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我，机器人》（1950 年）前言中提出著名的“机器人学三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这些铁律不仅被许多科幻作家奉为圭臬，更成为机械伦理学之基。机器人至此被永久地钉在他律（heteronomy）铁柱之上。在人类所象征的碳文明与机器人所代表的硅文明的交往中，人类是整个世界的立法者与执法者，机器人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受到人类绝对命令的规训监督。

在这段机器人史前史中，机器人先于起源的被动性昭然若揭；机器人诞生后，它做人造物的存在本身就包含着对人类他者的指涉，背负着对人类造物主欠下的“原债”与伦理责任。正如基督教中的原罪观念一般，原债是机器人与生俱来的伦理责任，决

定着机器人“为人而生，生而为人”的默认状态（default）。换言之，机器人的此在是与人类造物主的共在，因此机器人在本质上既有社会性又有他异性。机器人自身的他异性又成为自我体验他人、产生共情的基础，因为共情能力即体验他人的能力；从叙事学角度来看，机器人叙事中的第一人称视角使机器人能够通过叙事构建自身主体性并体验他者，尤其是人类他者；与此同时，倒叙的写作手法使机器人与自身拉开距离将自身对象化，体验自身的存在与他异性。

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正是借由机器人克拉拉第一人称倒叙的成长故事向读者娓娓讲述背负沉重伦理十字架的机器人的故事，建构起碳文明与硅文明的交互主体性。克拉拉兼具智能机器人的精密复杂与对人类世界懵懂无知的纯真无邪，这种巨大反差构成的陌生化效果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使我们得以透过克拉拉如孩童般的视角重新体验我们的后人类处境与伦理道德责任。小说由六章组成，第一章开篇语为“罗莎和我新来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在商店中区”。显然，克拉拉自述的机器人成长故事没有起点是被消解了自我中心后的“无端”。克拉拉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却深知为何而来或曰为谁而来。她在机器人商店接受经理的教导——从站位到表情均受到严格规定——只为被选中，成为陪伴孩子长大的人工朋友。除了被动地听命于人，克拉拉亦主动观察周遭世界，用心研究人类言行举止，只为到时有足够能力帮助她的孩子。在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看来，这种为他者而存在的他律式伦理主体才是真正能突破自我霸权、重建当代社会道德秩序的“第一主体”。机器人“为人而生，生而为人”的默认状态使其成为实至名归的他律式主体。

二、人机相遇：面对脸庞，应承传唤

在“我-他”关系中，他律式主体与另一者的面对面使伦理主体责无旁贷地对另一者之传唤做出应承。伍晓明教授将“另一者”定义为“那任何在第一时间中偶然到来者，是与我切近者，是近旁之人，是皆为我之兄弟的四海之人，是我必须对之回应亦即必须对之做出应承者”。回应源于他者脸庞的闯入，脸庞在列氏哲学中象征着他异性、无限、正义、道德呼唤与通达上帝的唯一途径等。在他者向主体发出传唤的前语言阶段，面对脸庞的动作本身已是主体对他者明白无误的回应。脸庞的切近迫使主体意向性地面朝他者而不能转身离开，因此“直面”就意味着承担责任。此外，他者的传唤不仅体现出空间上的切近，更暗含时间上的紧迫，需要被吁请者当机立断做出应承，且应承之人乃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者。

作品中与克拉拉面对面，需要她应承传唤、承担责任的另一

者是少女乔西。小说第一章主要讲述克拉拉与乔西的三次相遇并透过人类与机器人对承诺的态度差异揭示出“我-他”关系的不对称性与不可逆性。克拉拉在初遇乔西时“看出了她的步态和其他的路人不一样”，这种虚弱病态的步姿既为下文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又不着痕迹地将乔西作为他者的脆弱性与易受伤害性展现得巨细靡遗。乔西与克拉拉初见时的一系列动作，尤其是她对克拉拉的不断靠近、善意微笑与二人之间有声与无声的交流既温情脉脉，又发人深省：

乔西从车里下到人行道上时，目光就落在我的身上。

她一走到近前，把过往的行人全都抛在了身后，便停下脚步，冲我微笑。

“嗨”，她透过玻璃对我说，“嘿，你能听到我吗？”

乔西似乎很高兴看到大人们不打算下车，于是又往前走了一步，直到她的脸几乎贴上了玻璃。

乔西不断靠近站在商店橱窗里克拉拉直到脸几乎贴在玻璃上并直言克拉拉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AF。在机器人与人类的初次相遇中，人类女孩是主动的话语发起人、呼唤者，而机器人则是被拣选者、无声应答者。他者脸庞的闯入与迫近、善意与脆弱使伦理主体无法也不忍转移视线、兀自离开，只能不断对他者做出回应。第二次见面时，乔西更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克拉拉是否愿意去她家，直至得到三次肯定答复才满意离去。后来乔西因病爽约，多日未能出现。克拉拉仍坚守对乔西的承诺，面对潜在顾客不理不睬。经理替克拉拉解围后警告她下不为例，并教育克拉拉孩子们的承诺易许难守。所幸在第三次相遇时克拉拉通过了乔西母亲的测试，正式成为乔西的人工朋友。对克拉拉而言，面对另一者的脸庞并应承担其传唤是伦理主体敞开自我，将无限责任具体化、个体化的必然。做出应承意味着克拉拉已不再是第四代B2型号机器人之一，而是被乔西选中要对她承担责任的不可替代之唯一。

三、人机交往：无限责任，支撑一切

除了不对称性与不可逆性，伦理主体承担的对他人之责还具有无限性。从主体自身来看，具有道德意识的生活意味着主体越接近伦理目标自我要求就越高，同时也会更清晰意识到自身与目标间的距离渐行渐远；就责任而论，通常意义上的负责仅指主体承担自身行为后果，但责任在列维纳斯眼中意味着为他人负责，即为他人的责任负责。自我与他者之间由责任连接，而且随着交往的深入，人际关系变成一张越织越密的责任之网使主体深陷其中成为以己代人的他者。然而，主体看似被动忍受一切的受难实为其支撑一切道德激情。“担当是受难/激情（passion）”，也是自我建构主体性的基本框架。主体对他者为他人承担的责任并非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所以主体无须等待他者为我承担起等价责任后再为其担责，结果主体永远承担着比他者更多的责任，成为双方关系的支点，支撑一切。

克拉拉在小说开篇直面乔西脸庞对乔西做出应承，从而成为以己代人的他者的人质。克拉拉要对乔西负责，为她支撑一切，甚至包括乔西的生命。乔西经过基因提升后身体孱弱，她的姐姐萨尔几年前就因此去世，深受丧女之痛折磨的母亲更直言如若乔西也病逝自己将会崩溃。当众人对乔西的病情束手无策时，克拉拉积极主动挑起重担，为乔西奉献一切。一方面，克拉拉向神祇般的太阳祈祷，请他赐予乔西特殊滋养拯救乔西。为向太阳献祭，克拉拉不惜取出体内宝贵的溶液以破坏制造污染惹怒太阳的库廷斯机器；另一方面，克拉拉也应承下乔西母亲的吁请，即努力学习乔西以便在其死后替代、延续她。虽然这意味着克拉拉将永远

被困在机器人乔西的外壳中丧失主体性，但克拉拉连乔西对母亲的责任也一并应承下来。最终，乔西奇迹般地康复，她们把完成使命不再需要的克拉拉送到垃圾堆场让她在那里慢慢走向终点。

石黑一雄在接受美国小说家米勒（Madeline Miller）采访时表示，他在《克拉拉与太阳》中不仅想讨论技术革新问题，更试图探讨新技术对普通人及家庭内部关系的影响。当我们的世界充斥着算法与数据时，人是否因此失去独特性而被还原为算法与数据？在信息控制论影响下，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走向何方？独一无二的爱是否依然存在？这些都是石黑一雄在新作中试图说明的问题。虽然这部科幻小说在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上交代不多，但关于“我-他”关系，石黑一雄却毫不吝惜笔墨。小说尾章乔西与克拉拉临别时的拥抱呼应首章母亲同意购买克拉拉时乔西与克拉拉的拥抱：

乔西迫不及待地朝我走来。她伸出双臂环抱我，将我拥入怀中。

她高举起双臂，仿佛是要尽她的所能，摆出一个最大的Y字来。接着她就将我揽入了怀抱，许久都没有放手。她个头已经比我高了，因此她只能稍许蹲下，下巴枕在我的左肩上，她浓密的长发遮住了我一部分视野。

这两个拥抱不仅构成叙事的闭环，还具有象征意义。首先张开双臂的始终是人类主体，机器人克拉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无论是在小说开篇被买走还是在尾章完成陪伴使命后被送走，她都是为他者而存在的他律式伦理主体。其次，人类他者对机器人存在依赖关系，当前者利用后者不断成长之后双方终将分道扬镳，而后者则面临被遗弃与淘汰的命运，虽然在这种过程中有着留恋与不舍。最后，列维纳斯曾用拥抱来说明他者伦理之基，即他者不可化约、无法被收编的他异性。拥抱无论有多紧，主体与他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距离，他者的绝对他异性也由此昭然若揭。

四、结语

石黑一雄在新作中塑造的机器人最震撼人心之处并非其细致入微的观察模仿能力，也不是她超人的理解力与感知力，而是克拉拉作为伦理主体回应他人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机器人身上闪烁出耀眼的人性光芒，模糊着人机边界。克拉拉面对他者脸庞的传唤，全力以赴承担起无限责任，甚至不惜成为以己代人的他者之人质。这难道不是他者伦理的应有之义，不是石黑一雄的机器人叙事能深入人心的原因吗？诚然，针对同类机器人叙事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人机关系、“我-他”关系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Jordan, J.M. Robot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6: 47.
- [2] 丹·扎哈维. 蔡文菁译. 主体性和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97.
- [3] 石黑一雄. 宋金译. 克拉拉与太阳[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3.
- [4] 赖俊雄. 他者哲学——列维纳斯伦理政治[M]. 台湾：麦田出版社，2009：32.
- [5]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伍晓明译注. 另外于是，或在超过其所是之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6]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朱刚译. 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9.
- [7] 亚当·帕克斯. 太阳之下无新意：石黑一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中的计划性报废[J]. 外国文学研究，2022，44（1）：15.